

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
郑炳林 主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秦汉西北史地丛稿

刘光华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
郑炳林 主编

秦汉西北史地丛稿

刘光华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秦汉西北史地丛稿/刘光华著.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 8

ISBN 978 - 7 - 80714 - 253 - 9

I. 秦... II. 刘... III. 西北地区-地方史-秦汉时代-文集 IV. K294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9257 号

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

秦汉西北史地丛稿

刘光华 著

责任编辑/蒋 潇

装帧设计/洪 波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邮政编码/730030

电 话/0931 - 845487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印刷厂

厂 址/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 1648 号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355 千

印 张/14. 125

版 次/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数/1 - 1000

书 号/ISBN 978 - 7 - 80714 - 253 - 9

定 价/35. 00 元

如发现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缘起

郑炳林

西北史地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重点研究方向,从事敦煌学研究首先必须研究中国西北历史地理,只有熟通西北史地才能在敦煌学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绩。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多年来在西北史地研究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老一代专家贡献突出,成果斐然,主要体现在中国西北区域历史地理、中外文化交流、古代民族关系、区域史等方面。特别是在敦煌学研究平台建立之后,进一步支撑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使西北史地文化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研究水平。西北史地文化研究与敦煌学研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敦煌学是兰州大学的重点学科,早在1979年就建立了敦煌学研究机构,1983年筹建了敦煌学专业资料室,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学辑刊》,建立了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5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大学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1986年通过教育部申请到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资助,1998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成为甘肃省重点学科,1999年成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3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作为学科所在单位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敦煌研究院联合共建之后,优势互补,珠联璧合,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展,并逐步发挥其无可替代的地缘优势。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采取四种渠道,广泛开展学术交流。第一,举办学术会议;第二,学术访问;第三,申请国外及港台地区的各种基金项目,联合进行学术研究;第四,聘请国内外专家来研究所驻所研究。通过以上渠道,近年来研究所在学术交流方面取得很大成功。此外还将通过联合共建的形式,与美国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并与耶鲁大学共建中国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以便与国际接轨,提高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的培养水平。

要培养一流的敦煌学研究人才,就必须拥有一流的图书资料。在图书资料建设上,研究所采取购买、复制与接受捐赠三种手段。经过近几年的重点建设,本专业图书资料有了很大的改观,不但购买了齐全的敦煌学研究资料,如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永乐北藏、四库全书和续修等大型图书,以及近年或者以前出版的所有能购买到的敦煌学研究参考图书,还利用各种办法购置最近台湾地区出版的敦煌学图书和日文版图书。在图书采购中我们采取集中购买与零星购买相结合、个人购买与集体购买相结合等方法,力图在资料购置上做到齐全,为敦煌学专业培养一流的人才、出产标志性成果提供必要的研究条件。目前,研究所藏书达三万余册,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保证了敦煌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同时也为敦煌学界提供服务。同时还创建了敦煌学资料信息服务中心网站,在条件成熟后为整个学术界的研究提供网上信息服务。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还注意为国外培养敦煌学研究人才,招收国外留学生和中国港台地区学生,有读博和短期研修两种形式,主要来自于韩国国立汉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九州大学、青山学院大学、成城大学、东北大学、东京艺术

大学、东京女子艺术大学、龙谷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等。对留学生的教授辅导,对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也有很大促进,目前留学生培养已趋于成熟,教学和研修效果反映较好,得到派出机构的称赞。尤其是培养的日本留学生在敦煌佛教艺术研究上崭露头角,出产很多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敦煌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还体现在整体研究成果和研究方向上。敦煌学研究所承担有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际交流基金项目,特别是国际交流基金项目和博士生承担的基金项目增多是本学科的特色。敦煌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传统与优势,除了对部分文书进行分类整理和专题研究外,还将对俄藏敦煌文献和法藏敦煌文献非佛经部分进行整理研究,并逐步开展对甘肃藏藏文文献的整理研究;第二,敦煌史地文献与中国西北区域史地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多年来的研究重点,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出产了一大批研究成果;第三,石窟艺术和敦煌文献结合研究体现了我们的地缘优势。石窟艺术研究是敦煌研究院的优势,已基本完成了敦煌石窟的断代和壁画内容考释等大量的研究工作,代表了敦煌佛教艺术研究的国际水平。兰大敦煌学研究所与敦煌研究院联合共建之后,这一优势在双方的研究成果和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得到体现。今后还要进一步扩大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提高我们的教学和培养水平,出产更多敦煌学复合型研究人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敦煌学人才的培养基地。

中国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传统优势,特别是老一代专家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今后的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了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刊布出来,敦煌学研究所决定以“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名义结集出版,供学术界参考。

前 言

这是我关于秦汉西北史地方面的二十多篇文章的汇集。之所以有这些汇集的文章,则必须从对西北史地发生兴趣说起,这就要提及党的开发西北的战略。

我是一名高校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的教师,先是先秦史,后来下延至两汉,1960年代初期就已上课。1976年粉碎四人帮,更重要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到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全国人民深受鼓舞,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我所在的兰州大学历史系也不例外。高考的恢复,新生的入学,学校里热气腾腾。老师们除了认真备课,搞好教学外,科学研究的热情也很高。1980年代初,党中央已经有了开发西北的说法。兰州大学历史系地处西北,当时领导和一般老师还是沿着教育为政治服务的思路思考问题,常常在一块议论历史系如何为开发西北服务的问题。既然要开发西北,说明当时西北地区比较落后。

其实,西北地区不仅经济上与东部地区有很大的差距,而且政治上封闭保守,文化上也较落后。建国后西北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不能与东部同日而语。西北的落后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从事历史的教育工作者,应义不容辞地从自己的专业方面来考虑问题,来为开发西北制造舆论。这便是我对西北史地产生兴趣的初衷。

当时历史系古代史教研室的老师,人数是系内最多的,教研室也是最大的。其中有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有从事历史文献学的,有从事中国民族史的,还有搞考古学的。从事中国古代史的老师,主

要是关注河西及敦煌史地(包括敦煌文书、居延汉简);从事中国民族史的,则关注着西北民族史及民族学;从事历史文献学的,一部分参加了国务院古委会组织的古籍整理方面的一些工作,成立了古籍整理研究室,甚至领导上还考虑过成立一个以发掘和研究西北地区古文化为特色的考古专业。这些想法和做法,就是当时历史系领导和教师热情的集中反映。当然,有些想法并没有实现。在此后的教学和研究中,我却因此与秦汉时期的西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3年由我发起,计划编辑一部有关西北史地的资料书,定名为《中国古代西北历史资料辑录》。该提议得到历史系和古籍整理研究室领导的支持,调拨了有关图书,如二十五史和《资治通鉴》等,组织了有关人员,按中国古代史教学的四大段分了工。工作大体上开展了,但进度有快有慢。我承担的第一分册(先秦秦汉部分)进展较快,并在古籍整理研究室的资助下,于1988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计78万字,上、下册);而潘淑玉研究馆员(后调暨南大学)承担的第二分册(魏晋十六国北朝部分),完成的时间迟了一些,又因领导更换,经费无法落实,书稿一直储藏于书柜中,令人遗憾。至于第三(隋唐五代宋部分)、第四(元明清部分)分册,进展缓慢,未能完成。

1984年,我们古代史教研室应陕西人民出版社之约,编写《中国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我分工承担秦汉部分。因此在教学之余,开始了汉代西北屯田的研究工作。从搜集资料到写成初稿,整整花了三年时间。由于字数大大超过了规定,于是又萌发了将汉代西北屯田单独成册的想法。这就是1988年出版的《汉代西北屯田研究》一书的由来。

1990年代初,兰州大学出版社酝酿编写《西北通史》,希望西北地区的学者参与。最后决定该书共五卷,请谷芑教授担任主编。谷老不仅是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西域史专家,而且是土生土长的

西北人,一生主要在西北地区工作,在新疆一呆就是三十多年。他对西北地区的了解,对西北民族和西北历史的研究,造诣是很高的。他对《西北通史》的编写十分重视,除了参加会议,还亲自写了几篇有关《西北通史》撰写的文章,谈他对编写的看法。我参加了《西北通史》的组织工作和第一卷(先秦秦汉)的编写工作,每年和谷老都有几次接触,聆听他的指导和教诲,沿着他指出的要点解决编写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受益匪浅。现在《西北通史》已经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这就是西汉张掖郡骊靬县是安置罗马战俘城的问题。1989年9月《参考消息》和同年12月《人民日报》报道说:澳大利亚和苏联、中国的学者联合研究,发现了“很久以前消失了的‘罗马帝国’城市现存于中国戈壁滩的边缘”,“西汉元帝时代设置的骊靬城是用作安置罗马战俘的,这座城市在甘肃永昌县境内。”一时间国内大报、小报纷纷转载,达到了所谓家喻户晓的程度。其实这是一场言之凿凿的由权威新闻机构发布的荒唐骗局。因为1982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法国学者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一书中指出:1957年英国德效骞教授的《古中国境内一个罗马人的城市》中,就说今甘肃永昌县以南有一座小城名叫骊靬,是公元前36年时,汉将甘延寿和陈汤胜利地包围了一座由匈奴人所占据的中亚城市,共俘虏一百五十名外国雇佣军,在中国边塞地区建立了一座小城(即一座军营)来安置他们,这是结论。至于论据,除了没有史料依据之外,澳、苏、中三国学者完全与德效骞的理由相同,读者若感兴趣,请翻阅本书附录的德效骞教授的文章,即可清楚。这既是一个世界史的问题,又是一个中国史的问题。作为世界史问题,我知之甚少,无发言权;但由于留心古代西北史地,读过《丝绸之路》一书,知道了德效骞教授的观点,所以看到《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的报道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报道中的观点并不是什么新发现,令人怀疑有剽窃嫌疑。于是,1990

年我开始关注汉张掖郡骊靬县是否是安置罗马战俘城的问题。此后,不断有记者发表关于骊靬县是安置罗马战俘城的报道。但澳、苏、中三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发表出来。我关于骊靬不是安置罗马战俘城的几篇批评文章,都是针对记者的报道而发的。后来为了方便读者了解该问题的全貌,特写了《骊靬是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商榷》一文,作为结束。现在该问题又在热炒,说什么经过 DNA 鉴定,永昌人血液中有欧罗巴人种成分,这大概与地方迫切要求发展旅游有关吧。以上所说是我从事西北史地研究的过程。

这本论文集的编写与出版,应该感谢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及郑炳林所长。去年六月,郑炳林所长让我将有关西北史地的文章汇集起来,作为他们编辑的《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之一种出版。于是经过三个月的时间,选编了这本《秦汉西北史地丛稿》。它是我学习秦汉西北史地过程中的心得和编写的《西北通史》中的部分专题。其中的心得不多,还有一些是值得商榷的(如1980年代初关于河西四郡建置年代的问题等);一些专题借鉴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一些专题是对他人研究成果的概括。主观上希望它完美无瑕,但因受自身水平局限,其中的错误一定不少,甚至个别地方存在着前后矛盾的看法,恳请大家不吝赐教。

作者

二〇〇七年三月

目 录

嬴秦族的西迁、建国	(1)
秦襄公述论	(12)
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	(24)
西汉前期的西北地区	(42)
张骞与西汉中期的“断匈奴右臂”战略	(60)
西汉西北边塞	(78)
敦煌建郡于汉武帝后元元年辩	(115)
汉晋金城郡允街县方位	(125)
骊靬是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商榷	(132)
[附]古代中国一座罗马人的城市	
[英]德效騫著 屈直敏译	(162)
汉武帝对河西的开发及其意义	(191)
建郡后的汉代河西	(208)
论东汉敦煌在中原与西域关系中之重要地位	(229)
论西汉“徙民实边”不是屯田	(245)
西汉边郡屯田的管理系统及其有关问题	(259)
汉代屯田的几个问题	(274)
西汉屯田的亩产和经济作用	(286)
先秦时期甘肃的民族	(290)
也谈汉代的乌孙	
——《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商榷	(326)
关于西汉郅支城之战	(345)

《史记》李姓的地理分布和唐宋陇西李氏世系系统化的 问题	(367)
关于兰州历史上的几个问题	(384)
段会宗在西域活动的年代背景及其评价	(398)
东汉初年统一关陇的斗争	(413)
西北历史也曾一度辉煌 ——谈编写《西北通史(第一卷)》的一些感受	(435)

嬴秦族的西迁、建国

嬴秦族是甘肃历史上重要的民族。她起源于东方,夏末归商,成为商朝诸侯。商周之际,她开始西迁关陇,并在这里为周王朝和辑西戎。在与西戎的斗争中,她逐渐强大起来,受到周王朝重视,其政治地位由附庸而大夫而西垂大夫。在骊山之乱中,她因平戎救周有功又被封为诸侯,建立了秦国。本文综合学术界的意见,并结合自己的一些看法,就这段历史作一叙述。请专家批评。

一、嬴秦族源

嬴秦族是我国历史上的古老民族,她的男姓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大业、大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

颛顼,相传为黄帝孙昌意之子曰高阳者。这说的是秦人的母家。而其父系不详,仅知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大业。以鸟为图腾的乃东方夷族,如郑国国君曾说:“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1]郑君一口气举出了24个以鸟为氏的氏族,在部落中各有所司,其中“玄鸟氏司分者也”,即玄鸟氏是管理历法之官。这说明秦人的父系远祖,是东夷少昊部落中“司分”的玄鸟氏。大业,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大业即皋陶”;“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土”,司马迁认为大费就是伯

翳、伯益。皋陶、伯益是东夷族。传说东夷族与炎黄族关系密切，结成了部落联盟。伯益曾“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又“与禹平水土”，有功，因而被舜“赐姓嬴氏”。^[2]除了赐姓，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还有“受土”：“秦之先伯益尝有助于唐虞之际，受土赐姓”。伯益受土于何地？据《史记·秦本记》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这些嬴姓古国都分布在我国东方之山东、江、淮一带。这说明秦“受土”之地在今山东、江、淮一带。据研究，今山东范县有地名秦亭，或为伯益之封地。^[3]又，《墜方鼎》铭曰：

佳周公征伐东夷，丰白、專古咸戡。公归，荐于宗庙。戊辰，𩇛秦𩇛……。

铭文中的“白”，当释为伯；“專古”，即薄姑；“𩇛”，酒名。“𩇛秦𩇛”，即用秦地出产的清酒举行饮酒之礼。串释铭文为：周公东征东夷，丰白、專古都受到了惩罚。周公回到镐京，献俘获于宗庙，报告成功，并于戊辰这天，用缴获的秦出产的清酒举行饮酒之礼。“这里所谓‘秦’无疑指山东范县之秦，秦酒亦东征中的掠获之物。这说明周公东征的兵锋曾到过秦地。”^[4]这就是伯益的封地，亦即嬴秦的起源地。

二、嬴秦归顺商朝

禹任部落联盟酋长时，皋陶、伯益先后被部落联盟会议选举为禹的继承人。禹死后，由于“益之佐禹日浅”，禹子启破坏了民主选举部落联盟酋长的传统，杀死伯益^[5]，建立了王位世袭的夏王朝。

伯益有两子，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费氏的玄孙叫费昌，当夏桀之时，他去夏归商，参与了灭夏战争。他“为

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大廉有玄孙叫孟戏、仲衍，也归服了商王太戊，“遂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仲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6]关于嬴姓族人在商王左右做大官的，有以下卜辞纪录：

戊戌卜，宾贞，乎取(祭)秦。

弜秦宗于匕(妣)庚。

弜秦宗于匕(妣)庚古(故)。

弜秦宗。

弜秦……于小乙。

……未卜……有典于匕(妣)庚其奠秦宗。

……其酹曰于且(祖)丁秦右宗。

……禾于烱秦既。

上引卜辞中的“秦”，只能是舜封伯益的秦，即今山东范县秦亭；且丁是第17代商王，小乙是第22代商王，证明嬴秦后代确有在商都做大官的；商代后期都城为殷，上引卜辞出于殷墟，应是在商都任职的嬴秦族人对家乡和祖先遥祭的遗物；“宾贞”，是由名叫宾的王室卜史主持占卜；“秦宗”，当为秦地之宗庙，有“秦右宗”，亦当有秦左宗，知嬴秦人在东方人丁兴旺，有宗族分支，分别建立有宗庙。^[7]

三、嬴秦的西迁

商末以来，嬴秦族除一部分居住商王朝京师外，还曾有一部分西迁，或迁往今山西境，或迁往陇山东西；另外，西周初年周公东征，也俘获了一些嬴秦族人，将他们安排在了陕甘一带。先说迁今山西境内者。

蜚廉居霍太山 大廉玄孙曰孟戏、仲衍，其后代在今山西境内的活动地点，有霍太山。《史记·秦本纪》云：商朝末年，仲衍之玄

孙中湫生蜚廉，“蜚廉生恶来。……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死，遂葬于霍太山。”霍太山，《史记集解》引《地理志》曰：“在今河东彘县”，即今山西霍县。

孟增居皋狼 《史记·秦本纪》云：“蜚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皋狼，地名，《史记正义》引《地理志》曰：“西河郡皋狼县也。按：孟增居皋狼，生衡父。”皋狼在今离石县西北。所谓“宅皋狼”，如张守节所按：就是“孟增居皋狼”。

造父居赵城 《秦本纪》记载：“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穆王）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穆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穆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造父所封的赵，在今洪洞县北，与蜚廉所居的霍太山毗邻。

以上是秦人迁今山西境内后的几个据点，大致在今山西中部偏南。再说西迁今陕甘一带者。

中湫“归周，保西垂” 仲衍之子孙除在商都作官者外，有一位叫胥轩的，曾与西戎中的邠山部落通婚。《史记·秦本纪》记载了申侯对周孝王说过的一段话：“昔我先邠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湫，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说话的申侯，属申戎，亦称姜氏之戎。姬、姜一直有姻亲关系，申与周在政治上结有联盟。中湫因与申戎有了这层关系，很可能率领部分族人归周，迁往周人的西边。甲骨文中的率氏族和金文中的𠂔氏族，邹衡认为即秦的祖先费、蜚之类；发现于今陕甘一带的折肩罐上亚字框中有鸟，下加手的捕鸟形族徽，“其所代表的可能是一个善于捕鸟的氏族。古者以官职为氏，此氏族必定有位善于捕鸟的祖先，曾经充任过商朝及其以前的鸟（或鸟兽）官，而他的子孙又住在今陕甘一带先周文化地域内。所以，人们不难把这个氏族和秦的祖先联系起

来。”陕甘一带这一族徽所代表的,当是中湣所率西迁的嬴秦族人。中湣大约在周季历时西迁,但并未得到发展,所以文献中不见其西迁后子孙的活动事迹。其原因,或者是他的子孙在商纣麾下那样得宠,他未免要受到西伯昌的猜疑或忌恨,很可能在西伯昌翦商时将他们也要翦除。其氏族成员免不了入境随俗,年代经久,自然也就被当地同化,成为当地的居民了。因而在商末,隼族使用先周文化也就不足为奇了。秦的祖先为什么又到了西方,在这里似乎已得到了说明。^[8]

周公安置东征中俘获的秦人于弭邑 成王初年,武庚联合管、蔡及东方薄姑、奄等国发动叛乱。其实,已西迁于今山西的嬴秦族之蜚廉也参加了这场叛乱。据《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周公“伐奄三年,讨其君,驱蜚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五十”。上引《秦本纪》记蜚廉死后葬霍太山,或为假死而潜逃于东方,参加了反周的联合叛乱,妄图恢复商朝。但兵败被杀于海滨。周公“凡所征熊、盈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9]“九毕”可能是在毕原、毕道、毕国附近设置的九个新邑,以安置“俘殷献民”。今陕西蓝田县发现的弭氏铜器多件,重要的有《师酉簋》、《询簋》,均是共王时器。酉与询是父子关系,师是其官职“师氏”,掌教国子,并率所属守卫宫门。两器铭文列举他们掌管的供王驱使的虎臣和庸,由六个夷族构成,虎臣中有“秦夷”,庸中有“戍秦人”,可能就是周公东征俘获的嬴秦人。他们由弭邑的师氏掌管,弭邑或即九毕之一。^[10]周公还用东征时缴获的秦地出产的清酒,在镐京举行饮酒之礼,也说明周公确实到过今范县的秦亭,将秦人俘获后西迁。

大骆西迁犬丘 嬴非子是恶来的后裔。《秦本纪》云:“恶来革者,蜚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有学者主张秦人西迁犬丘,大约在恶来革被诛之后的大骆时代,因为今甘